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

(现代文学分册)

卢惠余 等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

(现代文学分册)

卢惠余 等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集.现代文学分册/卢惠余等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9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系列丛书/周晓娅主编)

ISBN 7-80171-846-1

I.中...

II.卢...

III.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9407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邮编:100009)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71-846-1

定价:120.00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丛书主编：周晓娅

责任编辑：刘清海

目 录

第一辑 总 论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演进轨迹 温潘亚(3)
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
——论建构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问题 温潘亚(18)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题材得失谈 沐金华(26)
中国新感觉派形成探因 潘海鸥(32)
中国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色 潘海鸥(40)
“自我寻找”意识的差异
——新感觉派小说与前先锋派小说比较 孙晓东(46)
战争与40年代的女性小说研究 沐金华(52)
人·女人·民族:40年代女性小说的主体意识 沐金华(65)

第二辑 作家论

- 鲁迅文学史思想综论 温潘亚(85)
论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探索 沐金华(96)
庐隐创作中的女性话语 沐金华(105)
试论闻一多的“幻象说” 卢惠余(116)
闻一多诗歌中的象征笔法 卢惠余(127)
闻一多的象征诗及其诗学意义 卢惠余(136)
闻一多诗歌的情感张力 卢惠余(144)

老舍文化人格论	郭锡健(156)
论丁玲的现代小说创作	沐金华(188)
情爱无价	
——读萧红散文	陈 非(196)
民族品性的失落与重构	
——论沈从文湘西题材系列散文	陈 非(202)
试论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李 伟(214)
40年代女性作家的世俗化审美心态	沐金华(223)
走单纯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	陈 非(239)
赵树理的初期创作与文学转型的多重契合	
——兼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调整 ...	陈 非(255)
两种身份 两种写作	
——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	
.....	陈 非(263)

第三辑 作品论

阿Q:人性丑陋的化身	
——《阿Q正传》新论	陈 非(281)
“反客为主”的宽恕	
——鲁迅《风筝》的另一种解读	徐 峰(292)
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意境美	卢惠余(299)
《春蚕》与《多收了三五斗》比较研究	卢惠余(310)
从守旧、迷惘中觉醒	
——论老通宝形象的典型意义	沐金华(320)
《榆树下的欲望》与《雷雨》的比较	孙晓东(325)
挣扎于围城中的“多余人”	
——简析方鸿渐的形象	沐金华(336)

20 世纪 40 年代的改革者

——评《在医院中》的陆萍形象 潘海鸥(344)

第四辑 教学论

教学风格美浅议 柏文猛(351)

教师语言艺术论 柏文猛(354)

文学作品教学的审美欣赏 卢惠余(359)

后记 (364)

第一辑

总论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范式的演进轨迹

温潘亚

文学史运动可谓是间断性与不间断性的统一,文学史发展的不间断性形成其纵向的发展线,文学史的间断性则使其形成上下限可以截断的独立坐标系,文学史的研究首先需要的就是找出其质变之点。但任何一种文学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1]而这种种“规范、标准和惯例”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主要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和《必要的张力》(1977年)等书中指出,所谓“范式”,主要就是该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它们影响、规定着该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提供思考、选择和解决问题的准则,规定了他们的基本思路,并为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

在文学史上,我们是可以找到这种范式的,在文学发展的特定时期,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影响的,有一种内在的机制把艺术主张相同、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结合成几个并立的创作团体,这种机制就是一种文学的创作范式,它是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许多中介层次的结构核心,来自社会生活的信息、经验、素

材等因素都必须经过这一核心才能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具体创作和作品。这种创作范式其实就是一个创作团体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审美心理结构,它通过作家鲜明独特、有强烈感召力的风格提供出来,于是信奉这一范式的作家就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表现方式等方面具有了相近的特色,这往往就形成文学流派。但也有不以流派形式出现的情况,如歌德、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普希金、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等大作家都曾为自己的时代及以后的文学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创作范式。库恩认为范式是使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文学创作范式的形成,也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达到成熟和繁荣的标志。这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一大堆零乱的作家、作品及琐碎的文学轶事、资料等等,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有内在机制和秩序统辖着的许多作家群及隐现着这一范式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格与流派等,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就成了有机结构起来的整体。

库恩还从范式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既非归纳主义者所描绘的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也非证伪主义者波普尔所说的是一个不断否定和革命的过程,而是一个积累和飞跃、渐进与革命不断交替的过程。即科学的发展需经过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学科形成范式前的“前科学”时期,亦称“前范式”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常常会出现意见分歧,所以又称发散式思维阶段;相应地,库恩称确立范式之后的时期为“科学时期”或“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所要解决的是“难题”而不是“问题”,科学难题的不断解决推动着常态科学向前发展,它一方面显示既定范式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又使科学在原有基础上以量的累积方式不断前进,这个阶段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是收敛式思维;常态科学有时会出现反常现象,即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人们无法用范式对现象作出解释,反常现象不断出现就可能引起科学分歧,互相争论,产生危机。库恩认为危机可能导致以下三种结局:1、常态科学解决反常现象,危机暂时缓和或平息。2、科学

家们认识到现有条件下严重的反常一时无法解决,留待后人,危机暂时搁置。3、出现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斗争,引起科学革命。前两种是暂时的,后一种则是必然的,最终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科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科学革命。这是对积累或发展模式的突破和中断,必然带来探索问题与解决问题合理性标准的改变,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新范式战胜旧范式,科学革命时期随之结束,科学发展又进入了新的常态科学阶段,新的范式成为该学科新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科学研究又在新范式影响下继续以累积的方式发展。但随着发展,新范式的科学研究又会出现新的反常,造成新的危机,从而再次引发科学革命,再次实现新范式向更新范式的转变,使科学发展进入更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就在这螺旋中不断前进。我们不妨将这一动态模式简化为以下图式:

前科学→常态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
→……

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演进轨迹,因为文学史研究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把创作范式的更替看作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文学史发展才能展现出一种动态的历史结构,这种历史结构是文学史本身客观具有的,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研究逻辑结构的起点,这可以看作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蕴含在文学史的累积和飞跃、渐进和革命不断交替的历史结构之中。

面对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其质变之点的把握,无论是从外部规律着眼,看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的关系,或从近代性、现代性、当代性、国民性、整体性,以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或启蒙、救亡和翻身的三重变奏等的视角切入,还是从内部因素诸如文本、形式、结构、语言等的细读展开,着眼点都应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自身所具有和呈现的种种特征构成的文学范式。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影响都会形成并渗透到范式之

中,而范式又折射出这种种影响。作为一个与旧文学有着很大截断性的文学系统,20 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发生、发展、兴盛、危机、变革的诸般演进与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即“前科学→常态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这一动态模式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对应关系,若以之为观照视角对揭示其发展的内在机制与逻辑进程,把握其不同时期范式的主要特征及演进轨迹,进而阐明范式的多元与多样,及其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才是文学走向繁荣的根本保证,并为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提供借鉴是极有裨益的。

一、前科学时期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20 世纪被视为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具有转型性的时代之一^[2],中国社会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民族危机——世纪之初西方列强的瓜分和 30 年代末的抗日战争。民族危机感对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鲜明对立。“国家”这一核心概念的频繁使用和“走向现代化”的民族焦虑,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与之同步发展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向,赋予其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性格。从“五四”至 1937 年的抗战爆发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科学时期,它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其范式的主体特征:

首先是发散式思维。库恩认为,既然已经证明现存的原则对其所面对的问题无能为力,那么,再死死守住这些无用的教条无异于阻碍科学的发展,这就需要变革,“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展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的确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维的特点。”^[3]20 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欧风东渐,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中国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发现在自己的生活圈外,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复杂得多、进步得多的大千世界,于是,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开始以开放的、发散型的眼

光观察世界,解释世界,进行全新的思考和探索。一批接受了世界现代文化洗礼的新文学家们也应时运而涌现于“五四”文坛,他们目光四射、广撷博采、纵横捭阖、气势恢宏、风格多样,在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上也是各有所主,难归一尊,大至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诸家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小至郁达夫的感伤主义、李金发等的象征主义、闻一多早期创作的为艺术而艺术,还有施蛰存、穆时英等的心理分析小说,等等。或提倡“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或主张“大众文学”、“国防文艺”,没有统一规范,争论不休,艺术形式、思潮流派的演变之快可谓是世所仅见。正如李何林先生1939年所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所言:“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时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了‘二十年’来反映它。”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发散式思维当是深层意义上的一个基因。

其次是人的觉醒。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极端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意识,其主流文化精神就是建立在对“个体”的抑制和扼杀之上的,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个体从未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从未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映到文学上便是强调以“载道”为宗旨,而不是去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思想、情绪和要求;强调作家们的“修养”、“内省”、“不苟言行”,以达到伦理纲常为准绳的心理调适和情感平衡,也就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境界,而不是激励人们去执着地追求生活,开拓生活;在表现方法上亦是重事不重人,塑造人物形象脸谱化、类型化,而不注重人物的个性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开掘。这些创作范式都是传统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其结果必将导致文学的单调以至僵化。从世纪之交到“五四”时期,随着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文化输入了崭新的个体意识,它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的一种意识,一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判断原则,就为批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找到了“全盘否定”、“彻底批判”的依据,人的价值和意义开始逐渐被发现和认识。周作人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鲁迅也十分重视人的价值与作用,早在日本时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要求“非

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4]强调个人的发展,个性的解放。还有当时其他新进的文学家,均在各自的作品中反映出解放人的要求,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必然走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次飞跃,一个转折。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自由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主义尚未得到真正确认,这不能不使这一时期的个体自由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影响,未能真正扎下根来,到了1937年前后,个性解放主题在创作中逐渐淡化,并最终为民族救亡和阶级解放的主题所取代,后者到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继而又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前科学时期开始的对人的发现毕竟标志了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学开始进入了现代期。

再就是文学的自觉。魏晋时代文学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特征与存在,与作为官方学术的儒家经学、史学、哲学分离。但只有前科学时期的文学才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觉,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否定旧有文学创作范式,构建新的文学范式:首先是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当然,伴随着语言变革的必然是文体的变革,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学的“艺术语言”,即作品的外形式、外结构,二是作者审视人生的构思方式、思维方式,即作品的内形式、内结构。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从这两点入手进行文体革新的。再就是运用白话创作格式新颖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从创作实践方面探索文体的变革。随着文学的觉醒和文学革命的深化,新文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它与人的觉醒互为因果地紧密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觉醒具有从中世纪的长夜迈向现代黎明的显著的时代特征,标志着我国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当然,这一切并非是在行云流水、平安无事中取得的,它经过了无数次的拉锯战和激烈斗争,而新文学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范式”。

第四个特征则是纷繁复杂的时代情绪。文学受时代情绪的制

约,情绪是时代的投影,而文学又昭示着时代的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崇尚中和之美,和谐是其重要的美学原则。“五四”时期,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日趋解体的封建社会,人们普遍有着一一种危机感,新文学家们感于内忧外患,一反过去中庸平和的心理情绪,在文学中表现出骚动不安、纷繁复杂的时代情绪。首先是强烈的非理性色彩。那种被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理性精神所压抑的、几乎丧失殆尽的人的欲望、人的要求,在“五四”非理性精神的狂潮中得到空前的释放,而文学革命又谱写了这一时代情绪中最耀眼、最辉煌的一页;其次是躁动不安的情绪,此乃“五四”一代作家自我意识深化和现代精神走向自觉的表现,它真实地记录了先驱者们痛苦、困惑、奋起、亢进的面影和心路历程,在那些孤独者、零余者、动摇者、迷惘者、幻灭者、追求者的灵魂深处,驱动着令人难以把握的思维定势。总之,“五四”文学革命中,到处充满着不和谐的声音,此乃新的文学范式诞生前的巨大历史阵痛和沉重反思,也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更促进和加速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变幻不定的态势,一切都翻了个儿,没有定规,没有框框,上述四个方面并不能完全涵盖前科学时期文学的所有特征,其主体风格可以概括为:悲凉、深沉、凝重。发展到三十年代,新文学逐渐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学,获得了自己的主导性地位。

二、常规文学阶段

1937年抗战的突然爆发,一度中止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将这个有纪念含义的历史符号带入到20世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对民族的文化结构和心理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态势,它使前科学时期渐趋形成的文学范式在其生命勃勃、生机盎然的发展期发生了断裂。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背景下的文学,面对抗战这一“特定情境下文学与现实权力关系结合,形成共名时期的‘文学’,实际上也标志了新文学的

终结,此后文学的发展已经很难涵盖在‘新文学’的范畴下。”^[5]抗日救亡成了时代的主旋律,“由于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原来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被推上了战争的主体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间文化加盟到新文化传统中来,使原有文化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发生了颠倒,一种新的文化规范随即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化”。^[6]这种“新的文化规范”亦即“范式”的迅速产生标志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常规文学阶段的到来。

这一阶段时间跨度很大,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76年的“文革”结束。范围很广,在30年代中期以后到1949年间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三个审美空间,即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且各自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要求,形成风格迥异的三种文学范式^[7]。首先是沦陷区文学因为地域(四个沦陷区)、文化背景(十里洋场与文化古都)的差异,其色调驳杂而不统一,但与华北沦陷区相比,“身处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更能反映出一种审美眼光的调整:作家对社会日常生活的精细观察及其表现,体现了对主流叙事的嘲讽和怀疑;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五四’以来欧化的小说叙事框架被突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被重新发掘和娴熟地加以利用”。^[8]就文学成就而言,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国统区文学在抗战前期的基调是呐喊的。194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主流反封建色彩的逐渐减弱,中年期的沉思色调得到了增强。新诗文学观念和眼光日益世界化,通俗小说则进一步走向了新文学,形式的追求日渐现代化”。^[9]而真正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常规文学这一长时段且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由解放区文学所倡导形成的文学范式,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导范式,我认为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收敛式的思维。作家们均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创作,“与非常研究时期要求科学家勇于创新相反,它要求一切科研